

新新媒介時代的學術平台

——以域出版為中心

桑 海

【提要】 在“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四年實踐的基礎上，中國高校學術期刊界同仁於2015年初提出了一種新的期刊數字化思路，即在開放互動的平台上進行以“專欄”為基本單元的學術傳播，並着手與數字服務商合作開發基於這一理念的域出版學術平台。如果說“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是從學術期刊自身困境出發採取的數字化對策，域出版則是從重構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新秩序的高度對學術出版體系的重新規劃。隨著新的媒介不斷興起並彼此融合，學術傳播乃至學術生產或許都將發生深刻的改變。學術期刊界有必要從媒介變革的角度對域出版作更深入的思考，並推動相關合作與實踐，努力使之成為適應新新媒介時代的學術平台，進而對學術生態產生正向的作用。

【關鍵詞】 域出版 超雲 學術平台 新新媒介 學術傳播 學術期刊

【中圖分類號】 G3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1 - 0104 - 10

引 言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數字媒介的興起，學術期刊在學術傳播鏈條中的樞紐地位動搖了；與此同時，中國學術期刊體制積弊已久，一場變革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期刊轉型與體制變革“這兩場歷史性變革的不期而遇已註定了它們的進程必然會交織在一起”。^①

在這樣的特殊歷史語境下，每個新世紀的學術期刊人都要同時面對雙重挑戰：一是按傳統的方式把刊物辦好，即所謂“內涵式發展”；二是在期刊轉型與體制變革中把握大勢和方向。期刊轉型與體制改革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諸多障礙與困境盤根錯節，常給人狐狸咬刺猬——無從下口之感。相對而言，期刊的“內涵式發展”則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容易帶來成就感，與期刊的直接利益結合也比較緊密，成為絕大多數期刊人的“務實”之選。我們或可借用一則禪宗公案來理解二者的關係。馬祖道一見南嶽懷讓在石頭上磨磚，忍不住問：“你磨磚幹什麼？”懷讓答：“我打算把它磨成鏡子。”道一不解：“磚怎麼能磨成鏡呢？”懷讓反問：“磨磚不能成鏡，坐禪豈能成佛？”從單刊的角度，儘管可以通過數字化、特色化、國際化、精品化等多種方式實現“內

涵式發展”，比如可以藉助經營期刊網站、微信公眾號加強數字化傳播，但這些還是在“磨磚”上下功夫，無法從根本上突破期刊發展的瓶頸，這反過來也為單刊發展設置了天花板。我們應當清醒地意識到，唯有範式層面上的轉型和變革，才有望開出中國學術期刊的新境界，為學術期刊人在未來數字化和全球化的學術傳播秩序中爭取更主動的位置。

2010年末，中國高校學術期刊界同仁提出了聯合創辦“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簡稱“網刊”）的構想，並於次年付諸實踐，其要旨是對各加盟刊文章按專業或專題進行數字化整合，並在網絡上開放傳播。2015年初，在網刊四年實踐的基礎上，他們又在探索一種新的期刊數字化思路，即在開放互動的平台上進行以“專欄”為基本單元的學術傳播，進而着手與數字服務商合作開發基於這一理念的域出版學術平台。

關於域出版已經有過一些討論，如朱劍從學術傳播秩序重構的角度對域出版的理念和背景做了清晰的闡述，^②筆者也曾撰文探討域出版平台的設計思路、^③學術編輯在域出版平台中的作用等問題。^④本文擬盡量避開上述角度，粗略地回顧域出版並不遙遠卻已經有些模糊的誕生過程，並嘗試從媒介的視角對域出版平台作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網刊：域出版的史前史

2010年9月，《南京大學學報》朱劍主編公開發表了高校學報專業化轉型和集約化、數字化發展的建設性方案，其要旨為：聯合教育部“名刊工程”的高校學術期刊，對各刊紙質版發表的文章進行同步數字化編輯重組，打破校域界限，成立聯合編輯部，創立若干一級學科專業期刊，組成“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期刊群，新創立的數字化專業期刊在期刊網上整體呈現，從而加深讀者對期刊的印象和歸屬感。^⑤

網刊創辦的前夜，期刊體制改革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多數學術期刊並不認同轉企改制的方向，但又無可奈何，學術期刊界瀰漫著一種前途未卜的焦慮情緒。也正是這樣一種危機四伏的處境，讓學術期刊的主編們更容易接受期刊人自己提出的改革方案，並以驚人的效率付諸實施。2010年10月12日在重慶舉行的名刊主編論壇，可以看作學術期刊界改革行動的策源地。葉娟麗教授對此有一段饒有趣味的追述：“這次會議期間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我稱之為學報的‘南湖會議’。仲偉民主編、朱劍主編，還有十幾位名刊主編開始謀劃創辦網刊。重慶會議之後僅三天，我們就收到仲偉民主編和朱劍主編起草的各種文本，網刊工作正式啟動。”^⑥

2011年3月，《復旦學報》、《南京大學學報》、《清華大學學報》、《武漢大學學報》、《四川大學學報》等17家“名刊工程”學報聯合發起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簡稱“網刊”），創辦了《文學學報》等10個一級學科的專業刊，在中國知網以開放獲取方式正式上線。

網刊方案是由學術期刊人提出的，這使得它在氣質上既不同於政府管理部門主導的頂層設計，也不同於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化設計，更不同於IT精英那種技術導向型的設計。誠如葉娟麗所說，這一變革方案既源於學術期刊主編們對未來發展的深層次的危機感，也是對其生存利益的一次理性的算計。^⑦從數字化或者說從媒介變革的角度突破期刊改革困局，這一做法的巧妙之處在於，“沒有闖入期刊改革的雷區，而是從側翼迂迴包抄，在原有期刊基本格局不變的情況下，在幾乎是一張白紙的網絡空間另起爐灶，再逐漸以新媒介自身的力量改變傳統的業態”。^⑧增量改革是中國學術期刊改革題中必有之義，因為要激發期刊人的積極性，只能是增量改革，從網刊到域出版都是以增量改革的思路來設計的。

網刊的出發點雖然是學術期刊的現實焦慮，但從一開始就有著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更多是以學術期刊群體的前途命運乃至學術發展和社會進步為己任，至於自己的現實利益反倒很少考慮。比如，網刊從一開始就堅持免費開放原則，團隊成員們以義務性的付出支撐了網刊六年來的運行。可以說，網刊的嘗試是學術期刊人理性思考與理想主義情懷的結合。

在取得不俗成績的同時，網刊的弱點也逐漸顯露，“紙本文獻的數字化重組只是網刊初級的形態，是網絡出版與傳統學術期刊出版體制妥協的結果。由於傳統期刊思維和體制因素的掣肘，網刊的發展已經進入一個瓶頸期，需要模式上的突破”。^⑨

網刊之所以會從蓬勃發展進入瓶頸期，或許可以從中國學術期刊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中來理解。2012年7月，原新聞出版總署頒佈了《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原則上不再保留報刊編輯部體制，編輯部要麼轉企要麼改為辦內部刊物。^⑩這種“一刀切”的改革方式在學術期刊界引起了強烈反彈。由於遭到抵制或消極對待，體制改革並未真正展開，但迫近的危機感讓學術期刊界進入一種應激狀態，更多的主編和編輯認識到，在變革的洪流中已經無法苟且偷安。在上層管理部門硬性的改革方案映襯下，網刊那種維持現有編輯部體制而在數字平台上另起爐灶的改革思路，在學術期刊人看來顯得格外貼心。或是在風雨飄搖中抱團取暖的心理需要，使得期刊界參與網刊的熱情迅速升溫，此時的網刊也出現了爆發式的發展。

在網刊初創時，發起者是17家高校學術期刊，2012年初又增加了4家，這21家都在教育部“名刊工程”的範圍之內。2012年11月，在《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公佈之後的第一次網刊工作會議——廈門會議上，時任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長的徐惟凡建議把網刊做大做強，得到了與會者的共鳴，會議決定網刊進行擴容。為保證網刊稿件的質量，運營團隊制定了嚴格的刊物入門標準，在CSSCI的技術支持下遴選出第一批擬擴容名單，並逐一發出邀約。到2013年春天在成都召開網刊工作會議時，網刊的成員已經新增了《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等49家，擴展到70家。成都會議之後，隨著網刊影響和吸引力的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學術期刊主動要求加入。筆者有幸擔任網刊擴容工作的協調人，在與諸多期刊互動的過程中，常為期刊界同行們參與網刊的熱情所打動，但也只能嚴格把關，忍痛婉拒了不少申請者。儘管如此，到2015年域出版理念提出的時候，加盟網刊的學術期刊已經增加到140家左右，包括《北京大學學報》、《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在內的高校優秀期刊幾乎全數加入。與此同時，專業刊的數量從10個增加到12個，有的專業刊之下還分設了二級學科的專業刊，更重要的是，陸續創辦了《三農問題研究》、《儒學研究》等7個問題邊界清晰的專題刊。專題刊在當時便被寄以厚望，與後來域出版的思路有明顯的連續性。隨著網刊的不斷擴容，稿件量急速增長，例如2013年第5期的《經濟學報》發文量達到119篇之多，《文學學報》和《歷史學報》也在100篇上下。加盟期刊的增多、稿件的增多、網刊種類的增多，使得網刊運營團隊滿負荷甚至超負荷地運轉，也促使網刊工作平台連續升級改進，網刊逐漸進入了一個發展的高峰期。

然而與此同時，外部環境也在悄然發生變化。“經歷了一年多的管理頂層與期刊基層的衝撞與磨合”，^⑪重組後的新聞出版行政管理部門——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於2014年4月發佈了《關於規範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有序發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⑫洪峻峰敏銳地指出，儘管《通知》文件名稱沒有出現“體制改革”的字眼，但其實質就是“重新提出學術期刊改革的實施辦法”，^⑬新的文件完全避開了“轉企”問題，其關於學術期刊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就是：編輯和出版分開和專業化、數字化、集約化發展。這就意味著，在期刊體制改革中，

學術期刊將作為特殊的類型享有特殊的政策。早在 2012 年初，朱劍已經提出“將紙本期刊與數字化期刊分開、將期刊編輯與出版發行分開對待的‘兩分開’辦法”。^④網刊正是一種“兩分開”的實踐：將紙質期刊與數字化期刊分開，暫時維持紙質期刊現狀，而在數字化領域進行“增量改革”；將學術期刊編輯與出版發行分開，編輯繼續留在高校和科研單位，實現編研一體，而出版發行則交給大型出版集團或網絡運營商。而學術期刊專業化、數字化、集約化發展，恰恰是朱劍的核心主張，也是創辦網刊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方案。

《通知》頒發後，學術期刊界與行政主管部門在改革方向上的分歧大大縮小，關係也更加融洽。例如，2014 年 5 月，在《清華大學學報》編輯部舉辦的“高校學術期刊轉型與發展戰略研討會”上，20 餘位高校學術期刊負責人與中宣部出版局、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聞報刊司和教育部社科司等期刊管理部門的負責人，就《通知》及學術期刊改革的政策進行了對話，會上開誠佈公的氛圍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學術期刊體制改革新方案相呼應的，是行政主管部門對學術期刊的資質認定與質量評估。劃清學術期刊與非學術期刊的界限，或許就是為了將在改革中享有特殊政策的學術期刊區分出來；而質量評估則是對學術期刊進行再次篩選剔除，建立退出機制。與強調“劣汰”的質量評估相應的是強調“優勝”的期刊扶持政策。2012 年的 7 月和 10 月，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分兩批公佈了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名單，約 200 家期刊得到了持續的資助，資助力度對學術期刊而言不可謂不大，對學術期刊辦刊條件的改善產生了明顯的效果。

這一系列的變化對網刊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網刊的理念和方向在政策層面得到肯定，對網刊的發展有很強的正向鼓勵作用；另一方面則緩解了學術期刊的改革壓力，特別是得到資助後穩定感的加強和經費上的充裕，讓很多期刊人在意識或潛意識層面增長了維持現狀的惰性。後一個方面或許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大約從 2014 年開始，網刊進入了一個發展的瓶頸期。

反觀網刊自身，是否也出現了問題呢？在實踐上，由於種種原因，很多設想難以實現，比如合作僅限於最終產品的重組，而沒能推進到出版全流程；網刊的發起者既不是社會團體也不是企業，而是分散的學術期刊，這些期刊編輯部幾乎都沒有獨立的法人身份，這導致了網刊主體身份的曖昧，也限制了外部資源的投入；由於缺少現實利益的支撐，提供技術平台的合作者投入動力不足，使得網刊缺少進一步發展的支撐。在理念上，網刊創辦針對的是紙本期刊的現實焦慮，儘管運用了互聯網技術，但在觀念上還沒有轉變為互聯網思維。比如，網刊仍執著於“期”和“刊”，時間上按期出版，形式上保持傳統期刊固有的模式，與紙本刊的區別只是搬到了網上而已，沒有真正發揮出互聯網的優勢。^⑤此外，由於網刊依附於期刊數據庫的平台，很難建立獨立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與更加媒介化的新一代互聯網平台相比，數據庫的觀念已經陳舊了，需要從媒介變革角度尋求突破。

網刊的存在，既有某種過渡性又有其獨立的價值，可能會與域出版長期共存。在可見的層面，網刊提升了加盟期刊文獻的能見度和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實現了學術期刊界前所未有的密切協作，加深了業內同行對於數字化的理解和認同，使得期刊界對域出版的接受水到渠成。

二、在媒介變革中孕育

在筆者看來，從網刊到域出版，其中的連續性遠遠大於斷裂性。域出版的基本要素，幾乎都已經蘊含在網刊早期的方案中。在網刊剛剛創辦的 2011 年，筆者讀過一篇以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聯合編輯部名義撰寫的文章，文中寫道：“‘雲出版’的誕生，意味著‘聚合’——內容的

聚合、平台的聚合、渠道的聚合——必將成為今後出版業最顯著的特徵，也必將加速手持終端取代傳統紙本書刊的過程，特別是非生活休閒類的學術書刊。那麼，在‘雲出版’時代，學術期刊將何去何從，是堅守紙本或獨立網站，還是走向聚合，擁抱‘雲平台’？這對社科學術期刊來說，是個頗為艱難的抉擇。而入選教育部‘名刊工程’的綜合性社科學報則邁出了走向‘雲出版’的第一步。”^⑥這種“雲出版”的觀念，非常明確地包含了“聚合”、“平台”、“移動終端”等互聯網思維的要素，不但可以涵括網刊的方案，離域出版也已經非常接近。正如文章所說，網刊只是“雲出版”構想付諸實踐的“第一步”。自從網刊創辦以來，網刊團隊對於網刊改進的醞釀從未停息，域出版正是這種長期思考的產物，將其看作網刊的迭代產品是比較準確的。

我們處於一個媒介快速變革的時代，而且這種變化還在持續之中。如果說，從紙本期刊向網刊轉型，是從印刷媒介向互聯網媒介的躍遷，那麼從網刊到域出版，則是互聯媒介內部的代際更新。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n）在2009年出版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中提出了媒介“三分法”：舊媒介、新媒介、新新媒介。他把互聯網以前的報紙、期刊、廣播、電視、電影等統統歸入舊媒介。舊媒介有確定的時空定位，比如日報每天出一期，月刊每月出一期，我們要耐心地等待出版，而且通常由專業人士生產和傳播，有一種自上而下的控制，遵循從中心向邊緣的傳播模式。新媒介是指互聯網的第一代媒介，發端於1990年代，譬如電子郵件、搜索引擎等，其特徵是信息一旦上傳到互聯網上，人們就可以按照自己方便的時間使用。新新媒介是指互聯網的第二代媒介，興起於世紀之交，譬如Wechat、Youtube、Twitter、維基百科等，其主要特徵是沒有自上而下的控制，信息的消費者也是其生產者，人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才能和興趣去表達和出版，而且通常是免費的。^⑦另一個常被使用的概念是“社交媒介”。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社交媒介（Social Media）是“人們用來創作、分享、交流意見、觀點及經驗的虛擬社區和網絡平台。社交媒體和一般的社會大眾媒體最顯著的不同是，讓用戶享有更多的選擇權利和編輯能力，自行集結成某種閱聽社群”。^⑧很明顯，“社交媒介”和“新新媒介”所指的基本上是同一類媒體，只是“社交媒介”更強調“互動”以及“社群”的形成。萊文森對“社交媒介”這一命名方式不大滿意，因為“社交”不足以涵括這種媒介的多重特性，而“新新媒介”則有更強的包容性。

“新新媒介”的內涵可以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不斷豐富，甚至為尚未出現的要素也預留了空間，這個概念的魅力就在於此。它提醒我們，“新”的媒介可能很快會變舊，而更新的又會出現。從網刊到域出版，雖然只經歷了短短幾年，但學術期刊界對新媒介的理解、接受和應用的能力，或者說“媒介素養”，已經有了顯著的變化。網刊已經是新媒介，而域出版顯然是一種更新的媒介，無以名之，姑且借用新新媒介這個概念來表達。網刊聯合編輯部主要是藉助QQ群召開會議或處理日常工作，這在幾年前還是一種很新的方式，“老編輯”們接受起來還頗費了一番周折；而域出版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微信群裡進行的。這或許可以看作媒介變革的隱喻，網刊和域出版的關係，就有點像QQ和微信。從媒介劃分的角度來講，紙本學術期刊是舊媒介，網刊已經屬於新媒介，而域出版則是一種新新媒介。

新新媒介的出現，為建立以促進學術交流為宗旨的學術平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這固然是因為新新媒介建立在更新更強的技術之上，克服了印刷媒介的某些缺陷，更重要的是，新新媒介的一些特性與學術自身的邏輯有一些微妙的契合之處。例如，學術交流在學術活動中本應處於中心地位，但印刷媒介的局限使得學術期刊的交流功能被壓抑甚至忽視，而新新媒介提供了即時便利的多元互動環境。再如，新新媒介生產者與消費者合一的特性以及免費分享的精神，與學術

生產和消費原本的性質頗有類似之處。限於篇幅，本文不能展開討論，待以後專文探討。

網刊核心團隊對未來的思考從未停止，一種新的思路在反覆的集體討論中不斷碰撞與融合，輪廓逐漸清晰起來，朱劍 2014 年 11 月在《光明日報》刊發的一篇文章，從媒介變革的角度預言了學術出版的未來走向，在域出版理念形成的歷史中有著特殊的位置。回過頭來重溫此文，會發現域出版的理念此時已經基本成型：“我們不妨從技術角度大致勾勒學術新媒體的若干特徵。其一，學術信息的傳播更為迅捷。互聯網徹底改變了紙本時代從中心到邊緣的縱向傳播模式，實現了橫向的共時態傳播，傳播不再有任何物理障礙。其二，大量學術信息的聚合（大數據）構成了開放的公共學術平台。在這個大平台上，傳統學術期刊已無法獨立存在，傳播的單元已從期刊變為單篇論文。其三，為改變巨量信息聚合而導致的無序狀態，學術期刊將以新的形式呈現，那就是學科或問題邊界清晰、組合靈活的個性化期刊，並形成有序組合的期刊體系。”^⑩

三、域出版理念的誕生

據朱劍回憶，域出版誕生的過程大致是這樣的：“2015 年年初見到汪新紅（超星副總經理，域出版項目負責人），跟她說起應改變知網模式，專欄應該是未來互聯網傳播的基本單元，開放獲取是不可阻擋的潮流。汪深以為然。三月，史超（超星公司總經理）在南京找到我，告知超星要進軍期刊傳播，問對策，我告知以與汪談話的內容，談得更具體和深入，談了有三個小時，得到史超的贊同。三月初，清華開文學編輯會前，與桑海有交流，得到桑海贊同。文學編輯會時，正式在會議上談以專欄為基本單元的設想。會議期間再次見史超，商談合作。此後，超星大張旗鼓地推出域出版。”^⑪

在 2015 年 3 月初，筆者與朱劍有一次電話交流，商談高校學術期刊界數字化合作的新方向，他着重闡述的就是“專欄應該是未來互聯網傳播的基本單元”這一思想。朱劍、仲偉民與史超在清華近春園會面時，筆者在場，印象最深的，除了朱劍對專欄傳播以及在線平台的描述外，還有他對那種類似於 ZAKER 的私人訂製的信息聚合功能的熱衷，以及對堅持免費開放獲取的反復強調。史超對朱劍所描述的平台抱有很大的興趣，並原則上接受了免費開放獲取的合作前提。雙方在這次會談中初步達成意向，學術期刊界與超星公司合作建設平台，學術期刊方面提供設計方案、內容資源和編輯力量，超星公司則負責平台開發、技術支持、產品推廣等。

筆者在清華大學籌辦的“首屆學術期刊文學編輯論壇”，有幸成為域出版理念誕生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論壇的第二天，即 2015 年 3 月 12 日上午，朱劍為與會的文學編輯做報告，明確指出“專欄是在線數字傳播的最佳單元”，因為“專欄學科邊界和問題邊界最為清晰，可以完美對應學術共同體，是最合適的共同體交流平台；依託專欄可以實現編輯與專家完美結合，由專家擔任的專欄主持人可以組織學術研究，甚至引領學術研究，以專欄為單元的學術傳播最具影響力；專欄最能體現編輯思想、編輯理念和編輯不可替代的作用；專欄最能發揮綜合性學報的優勢，具有持續發展的能力；專欄也是最佳跨校合作單元”。^⑫令人信服地論證“專欄是在線數字傳播的最佳單元”，是朱劍對期刊數字化多年思考的結晶，也奠定了域出版的理論基礎。^⑬

朱劍還對建設“數字化傳播平台”提出了基本設想：在統一的數字平台上包含多個邊界清晰的專欄；以專欄為單元的私人定制期刊；不按“刊”的週期出版，隨時刷新；聘請一流專家擔任主持人；建立審稿專家庫；以專欄為依託舉辦學術活動；專欄內作者、編者與讀者的互動；以專欄為中心的學術評價，真正的以文評文；以專欄為中心的新媒介傳播；等等。^⑭一位與會記者對

私人定制期刊的設想做了這樣的描述：“以專欄為基本單元的私人定制期刊，或將成為未來期刊的新模式”，“如果一級學科設 20 ~ 30 個專欄的話，那麼，將會有幾百個專欄陳列在數字化平台上，讀者可以隨意訂閱他感興趣的專欄，把它組成一本獨一無二的雜誌。”^②儘管在這個報告中，朱劍並沒有說出“域出版”這三個字，但域出版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備。會上筆者也從學術傳播媒介變化的角度對學術期刊的本質進行了探討，並對在線學術平台的功能有所勾勒。這次會議上對域出版理念作了最早的公開完整表述，可以看作域出版理念的誕生地。

2015 年 3 月，筆者在為即將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的“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撰寫的會議論文中，論述了在線學術平台將會取代學術期刊，成為互聯網時代主流的學術平台，提出應該從學者的需求出發設計構建在線學術平台，並從六個方面對平台提出了框架性的構想。^③這篇文章反映了筆者當時對新平台的理解程度，同時也是對平台進行框架設計的初步方案。

四、域出版的命名

“域出版”這一詞語組合是由超星公司提出的，這或許與該公司已有的產品“域搜索”有關。在 2015 年 4 月的澳門會議上，汪新紅已開始使用“域出版”來指稱超星公司正在開闢的期刊業務，這也是筆者第一次聽到這個詞語組合。大約從 5 月開始，超星公司開始動員各期刊編輯部簽署域出版合作協議。從當時的協議文本看，域出版還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日漸清晰，是在學術期刊有更多介入之後。但從域出版的概念史角度看，超星公司還是在三個方面作出了貢獻：一是以“域出版”為“以專欄為基本傳播單元”的出版理念命名；二是使這個理念迅速傳播；三是為這個理念的不斷豐富留出了足夠的餘地。

就筆者目力所及，最早涉及域出版的公開文章是《域出版：學術期刊的移動新陣地》。文中寫道，超星“日前研發實施了學術期刊移動出版提升工程——域出版，是其在國內外著名高校深耕 22 年、服務近萬家機構後的一項創新”，“當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維普資訊等形成各自的競爭優勢後，超星集團的域出版無疑是學術期刊從基於 PC 端的數據庫與網絡出版提升到基於智能手機的互動服務與移動網絡出版的一次‘大跨欄’”。^④雖然作者是一位傳媒研究者，但這篇文章的敘述似乎卻是從企業的視角出發的。比如文中寫道，域出版“以先知先覺的學術期刊從業者為合作夥伴”，句中缺省的主語就是“超星”，而“學術期刊從業者”則是明顯的“他者”。這篇文章是作者 2015 年 5 月參加“全國書刊業融合新媒體發展經驗研修班”的調研成果，^⑤其信息來源或許是超星的介紹。

稍後，汪新紅在一篇文章中對域出版做了闡述：“域出版理念於 2015 由中國領先的數字出版方案提供商超星集團首次提出。超星的學術期刊域出版方略，是基於其發現、百鏈、讀秀等具有龐大使用者基礎的數字出版平台以及最新研製的‘域出版平台’來實現的。”^⑥從中可以看到，域出版至少包含三個不同的層面：首先是一種理念，即理論層面；其次是一種方略，即戰略層面；再次是一種平台，即技術和產品層面。文中對域出版的概念作了這樣的界定：“在數字出版中，期刊編輯部按學術規範處理完稿件後，根據稿件內容決定編入哪個專題欄目，這個專題欄目就是‘域’，按‘域’組織發佈和出版傳播數字論文，就是期刊的‘域出版’。”^⑦很顯然，這是對朱劍觀點的重新表述，所不同的只是用“域”替換了“專欄”。由此可見，超星提出的“域出版”，其實質就是以“專欄”為傳播單元的數字出版。2015 年 6 月 10 日，某微信公眾號發佈了一篇帶有超星官方色彩的文章，把域出版定位為“期刊移動出版提升工程”，對“域”和域出版的界定

與汪新紅的文章非常類似。^⑩

2015年11月舉行的“圖書館知識服務空間構建學術研討會暨雲舟上線儀式”上，史超在報告中明確指出，是朱劍提出了域出版的理念，並多次引述朱劍“重建學術傳播的新秩序”的說法。很明顯，超星完全認同並全盤接受了期刊界提出的以專欄為中心的期刊數字出版理念，並將之定名為“域出版”。也就是說，在域出版概念形成的過程中，學術期刊人貢獻了其理念內涵，超星則貢獻了“域出版”這個名字。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個名稱主要是超星在使用，學術期刊界鮮少有人用“域出版”的說法，而是用“專欄出版”、“在線學術平台”、“新平台”等來指稱。隨著超星推廣力度的加大，域出版這個概念逐漸傳播開來，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術期刊界對其接受的程度也越來越高。朱劍在《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戰略為中心》中採用了與“域出版”相類似的“專域平台”一詞，在近期的文章中更是開始直接使用“域出版”。“全國社科期刊創新聯盟”2016年9月在吉林大學召開的“‘域出版’暨學術期刊聯盟建設研討會”，第一次明確把域出版作為會議的名稱，標誌著這個名字已經正式被學術期刊界所接受。

期刊人之所以會接受以“域出版”來命名“以專欄為基本單元的出版模式”，是因為“域”是一個很好的概括，簡潔明瞭地提煉出“外部邊界清晰，內部結構嚴謹”的意涵。學術期刊人與超星不約而同地把域出版描述為一個“平台”，但在對這個平台內涵的理解和實際運用上卻存在一些差異。比如，在超星看來，域出版似乎主要是一個期刊數字化網絡化出版的技術平台，可以匯聚海量的出版資源，並提供了各種技術支持。期刊人則對這個平台有著更多重的期許：它應該既是技術平台又是傳播平台，即不僅面對期刊，還要面對受眾；同時，它既是平台，也是產品。這種差異也許應當理解為一種“視差”，超星主要着眼於數字技術與資源整合，期刊人主要着眼於期刊數字化和在線傳播。由於兩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來打量域出版，得到的視覺印象不同，便形成了“視差”。或許，雙方的印象疊加在一起，才是對域出版平台更完整的理解。相信域出版這個概念，會在雙方未來不斷的溝通與合作中實現“視域融合”，內涵越來越豐富和完善。

五、平台的初步構建

2015年5月在南開大學舉行的“綜合性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傳播方式”研討會上，圍繞以專欄為中心的新平台做了報告和討論。這是學術期刊界為域出版合作進行的前期準備。

關鍵性的轉折發生在2015年6月。從6月11日到12日，朱劍、仲偉民在北京與超星負責人進行了一次漫長的討論。超星基本接受了期刊人提出的初步方案，特別是無條件開放獲取的合作前提，同意投入相當大的人力物力與期刊人共同開發域出版平台，雙方的合作由此正式開始。期刊人與超星之所以能就“域出版”的方案達成共識並開啟合作，正是基於雙方資源上的匹配與理念上的共識。在域出版的方案中，學術期刊的內容資源、編輯力量與超星技術力量、數字資源、用戶渠道可以充分地結合。這也意味著，無論從數字服務商還是從學術期刊的角度，“域出版”都是符合未來發展趨勢的最優選擇。

緊接著，6月18日，新平台籌備組就利用端午小長假在武漢大學開會，這也是學術期刊召開的第一次新平台工作會議。會上討論了關於新平台的一些基本問題，比如運營主體、組織架構、設計思路、合作協議等等。7月，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業務培訓在呼和浩特舉行，籌備組決定利用這一機會，將運營團隊主要成員以及新定的各學科負責人召集到一起開會。以理事長

蔣重躍教授為首的研究會領導班子，對新平台的籌備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支持，本次培訓會上的主要內容也調整為宣講新平台。與網刊不同的是，新平台的參與者不限於高校學術期刊，而面向所有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而且不對參與的期刊設立門檻，只對稿件質量有統一的標準。新平台的理念一經發佈，就得到了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界的普遍歡迎。

2015年10月，籌備組在域出版的工作微信群裡徵集新平台的名字，經過一番熱烈的頭腦風暴，最終將產品平台定名為“超雲”。其後，一大批依據學科或問題領域建立的學者編輯互動群在微信上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11月，籌備組將平台設計的文字稿交給超星，李宏弢等人起草了單刊與超星的標準合同，其核心原則是期刊將內容資源無償授權給超星在網上傳播，前提是向所有用戶免費開放，從而為未來“超雲”平台的開放獲取和衍生功能的開發奠定了基礎，平台開始進入實質性的開發階段。

2015到2016年間，從南開會議開始，學術期刊界圍繞新平台的建設召開了多次研討會，除前文提到的會議之外還有：9月在陝西師範大學舉行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網絡專欄合作方式”研討會、2016年4月在重慶大學舉行的“學術期刊專欄出版暨學術平台建設”研討會等。在這些會議上，討論了平台設計的細節、編輯團隊的組織、專域的設置、審稿專家庫的建設等一系列實際問題。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專門成立了“全國社科期刊創新聯盟”，作為“超雲”平台的運營機構。正如葉娟麗在重慶會議上所說，“從南開會議到西安會議，開始轉入新的時代，即關於專欄合作的超雲時代”。^⑩僅從這些會議的名稱就不難看出，學術期刊界對新平台的認識和接受程度在逐漸加深。

2016年以來，超星方面加快了域出版系統開發的進度。2016年9月在“全國社科期刊創新聯盟”主辦的“‘域出版’暨學術期刊聯盟建設研討會”上，域出版平台首次上線試用。10月20日，超星在北京召開“媒體融合·域出版平台發佈會”，正式發佈域出版平台。

工作平台已經搭建成功，接下來就要開始搭建產品平台以及面向受眾的傳播平台了，這雖然鼓舞人心，但推進起來也異常艱難。如今的超星“學習通”，儘管仍有不小的改進空間，但已經是一個比較好的“域出版”技術支持平台，可以藉此實現期刊的解構和重構。但“學習通”只是一個技術平台，還不是一個適合受眾的傳播平台，更不是一個產品。目前，域出版的產品平台“超雲”正在積極構建之中，這個未完成部分，必須要由期刊人來唱主角。從提出構想至今，將近兩年的時光過去了，真正意義上的域出版產品仍未問世，與當年網刊的迅速付諸實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昭示著，域出版是遠比網刊更複雜的一項系統工程。

與網刊類似，在域出版理念孕育和產生的過程中，要同時考慮技術與體制兩種背景因素。域出版提出的目的，主要在於讓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國際學術傳播中爭得一席之地，其本土化特徵非常明顯。這是因為域出版是在特殊的背景下提出的，這一背景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技術的發展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就決定了數字化轉型是中國學術期刊的必由之路。二是今天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不僅不符合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規律，而且也不符合紙本時代的規律，因而其轉型必然是媒介形式和體系化重構的合而為一，其難度可想而知。三是中國特有的期刊體制即以審批制為核心的主管主辦制度，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很難有根本改變。期刊人雖然有危機感，但同時也有幻想和惰性。這就決定了如果由中國學術期刊人來承擔轉型和重構的使命，必然要走一條與西方不同的、更為艱難的道路。域出版就是一種尋路的嘗試，至於這條路究竟能走多遠，通向何方，則有賴於讀者諸君的共同思索與努力探尋。

- ①朱劍：《變革年代學術期刊的數字化生存》，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年第2期。
- ②朱劍：《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戰略為中心》，武漢：《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2期；朱劍：《學術共同體、學術期刊體制與學術傳播秩序——以媒體更迭時代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轉型為中心》，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3期。
- ③⑧⑨⑮⑳桑海：《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在線學術平台——“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未來之構想》，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 ④桑海：《學術編輯：學術傳播新模式的靈魂——以“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和“域出版學術平台”為例》，北京：《傳媒》，2016年第19期；
- ⑤參見朱劍：《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設為中心》，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
- ⑥《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整理：《學術期刊專欄出版暨學術平台建設——研討會會議實錄》，重慶：《重慶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 ⑦⑳參見葉娟麗：《中國大學學報：制度變遷與路徑選擇》，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
- ⑩參見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2012年7月30日印發），北京：《中國新聞出版報》，2012年8月3日。
- ⑪⑬洪峻峰：《當前學術期刊改革的頂層設計與底層回應》，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 ⑫參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關於規範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有序發展的通知》，新廣出發〔2014〕46號文件。
- ⑭朱劍：《傳統與變革：體制改革前夜學術期刊的艱難抉擇》，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2年第1期。
- ⑯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聯合編輯部（朱劍執筆）：《“雲出版”視角下的學術期刊——以“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為例》，2011年，未刊稿。
- ⑰參見保羅·萊文森：《新新媒介》，何道寬譯，上海：

-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 ⑱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5%8C%96%E5%AA%92%E4%BD%93>
- ⑲朱劍：《學術期刊的新媒體轉型與融合發展》，北京：《光明日報》，2014年11月3日。
- ⑳資料來源於2016年11月12日對朱劍的微信採訪。
- ㉑㉒朱劍：《再論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兼論專欄在學術在線傳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015年3月13日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主辦的“首屆學術期刊文學編輯論壇暨‘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文學學報》研討會”上所作的報告。
- ㉓朱劍的這一理論在後來的多次學術會議上不斷複述和深化，並形諸文字，代表性文章是：朱劍：《構建互聯網時代學術傳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學術期刊發展戰略為中心》，武漢：《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2期。
- ㉔孫妙凝：《學術期刊編輯應走上學術在線傳播的前沿》，中國社會科學網，2015年3月31日，http://www.cssn.cn/zx/bwyc/201503/t20150331_1567947.shtml
- ㉕李祖平：《域出版：學術期刊的移動新陣地》，北京：《中國新聞出版報》，2015年6月4日。
- ㉖㉗㉘汪新紅：《移動與社會化網絡環境下人文社科學術期刊數字化發展路徑探析》，見李向玉主編：《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 ㉙參見《域出版——期刊移動出版新路徑》，“主編匯”公眾號，2015年6月10日。

作者簡介：桑海，澳門理工學院講師，《澳門理工學報》編輯，博士。

[責任編輯 劉澤生]